

一件T恤 的全球经济 之旅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为什么愈演愈烈？
全球化时代的自由市场将何去何从？
透过一件T恤的不平凡经历
深入解读隐藏在国际贸易背后复杂的政治与
权力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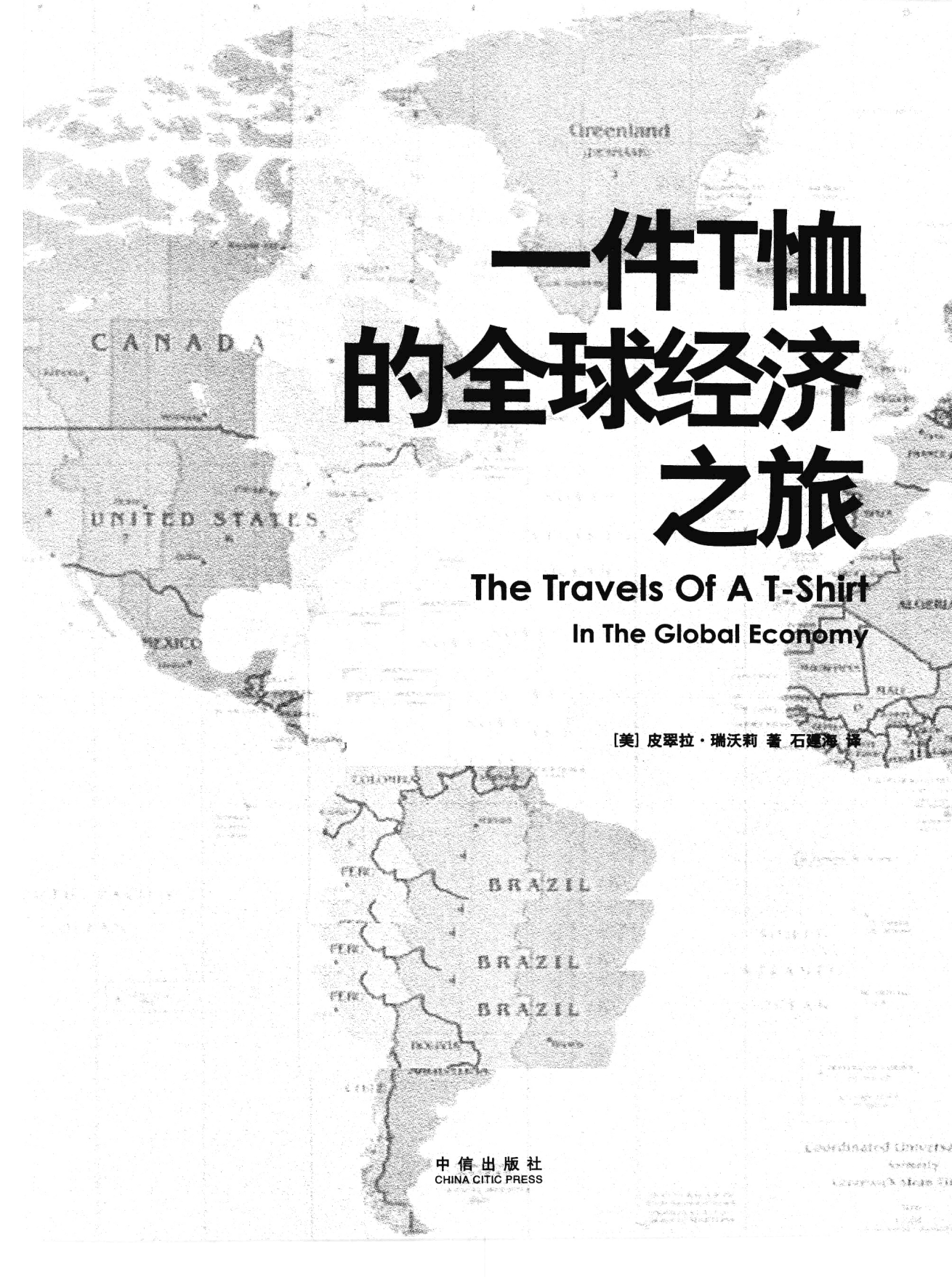


入选《金融时报》“最佳财经书奖”
亚马逊网络书店“编辑首选十大好书”

【美】皮翠拉·瑞沃莉 著 石建群 译



中国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一件T恤 的全球经济 之旅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美] 皮翠拉·瑞沃莉 著 石遵海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 / (美) 瑞沃莉著; 石建海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BN 978-7-5086-2499-0

I. —… II. ①瑞… ②石… III. 经济一体化—通俗读物 IV. F114.4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6015 号

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 by Pietra Rivoli

Copyright © 2009 by Pietra Rivol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

YIJIAN TIXU DE QUANQIU JINGJIZHILÜ

著 者: [美] 皮翠拉·瑞沃莉

译 者: 石建海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4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5263

书 号: ISBN 978-7-5086-2499-0 / F·2172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献给丹尼斯、安娜丽莎和丹尼



1999年2月，天气寒冷，我目睹了大约100名美国学生在希利大楼前的台阶上集会，该大楼位于乔治敦大学校园内，是哥特式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学生们群情激奋，校园保安在人群周围来回巡查，以防出现突发事件。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拿起话筒，几乎每一句都会赢得学生们的喝彩。听众在道德上肯定演讲者的观点，他们目标一致，看着这座令人惊诧的复杂的迷宫，他们清楚地看到了黑白是非。企业、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坏蛋，它们无情地摧毁了几乎全世界所有工人的尊严和生计。不久后，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年会上，5万多位志同道合的激进分子加入学生的队伍中。2002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参加示威的人数已激增至10万。反全球化激进分子在加拿大魁北克、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会议上捣乱。2003年，在坎昆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激进分子的行列中又多了一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精力充沛的代表队伍，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严重分歧最终使这次世界贸易谈判破裂。反全球化激进分子来自大学校园、工会、宗教组织、倒闭的纺织厂、人权组织和非洲的棉花农场。这些激进分子被统称为“全球化的反对者”。

一开始，反对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办公场所的冲击让人措手不及。“左翼”的《华盛顿邮报》在调查了发生在西雅图的骚乱之后，对此也感到

大惑不解。“究竟为什么？”他们在第二天的社论版上问道。从位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楼高层的办公室望去，大楼下面是一群由下层人士组成的反对者队伍，这些人的动机很好却被人误导，他们挡住了人们通往富裕的唯一通道。从传统的经济常识来看，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提供给穷苦的被压迫者的是救赎而非灾难。对抗者怎么连这都不懂？

2005年前后，反对者似乎平静了下来。“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在说，“太好了，终于结束了。”但你如果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结束，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些疯狂的口号（“资本主义就是死亡！”）消失时，对抗者并未消散，反而成了主流人群。有调查显示，美国人2008年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支持率明显低于21世纪初的支持率：2002年，78%被调查的美国人 对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而到了2008年，只有53%的美国人勉强支持国际贸易。事实上，美国人对国际贸易的支持率远低于其他工业国家的公民。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对民众的这种不满作出的反应是进一步阻挠贸易自由，因此，2008年的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回应与1999年的抗议者的口吻惊人地类似。2008年，被抗议者阻挠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在西雅图和坎昆依然进展不大。该谈判历时8年，几乎毫无成果。谈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困难，而2008年年底开始的严重的经济衰退更使自由贸易的复兴毫无希望。

追溯到1999年的乔治敦，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子抓起麦克风。“你们的T恤是谁做的？”她问听众，“是一个被拴在缝纫机上的没有食物和水的越南儿童？还是一个每小时只挣18美分，每天只能上两次厕所的印度女孩儿？你是否知道她与12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是否知道她与别人同睡一张床，而且只有稀粥喝？你是否知道她没有言论自由和结社权？你是否知道她不仅忍受贫穷，还要忍受肮脏和疾病，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耐克挣钱？”

我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开始思考这位年轻女子手持麦克风时所说的话，她是怎么知道的？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周游世界进行调查。我不仅发现了我的T恤是谁制造的，还走了几千英里跨越三大洲追寻它的故事。这次调查的结果即本书第一版的内容（第一版出版于2005年）。这本书是一个关于全球化以及那些制造我的棉质T恤的人、政治和市场的故事。

很自然，有人会问一件T恤的传记会对当前的全球贸易争论起到什么作用。一般而言，今天的商业或经济学研究素材都已过时了。我们从这些素材中几乎学不到什么，争论仍在继续，因为它们只给我们提供“趣闻”般的数据。根据今天广为接受的方法论，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故事和逸闻也许具有娱乐性，却不具有学术性：故事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检验理论或总结理论。结果，今天的研究者虽然拥有了更多的数据、运行更快的计算机和更好的统计学方法，但是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却越来越少。

当然，故事在其他学科受到了更多的青睐。理查德·罗兹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子弹诞生记》(*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一书中，详细叙述了原子弹是如何发明的。其中，他阐述了参与原子弹制造的一群天才在学识上的进展。劳雷尔·乌尔里克在《一位助产士的故事》(*A Midwife's Tale*)中用一个普通妇女的日记的形式描述了200年前缅因州丛林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面貌，这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尔泽尔在《创业精英》(*Enterprising Elites*)一书中讲述了美国首批实业家的故事及他们在19世纪的新英格兰建立的世界，由此为我们展示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所以，关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的故事不仅揭示了一种生活，也阐明了塑造这种生活的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是我写T恤故事的目的。

“这个世界真的需要又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吗？”这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在其2004年出版的书的序言中对该主题的疑问。当然，无论是为抽象的全球化和贸易辩护还是对其进行批评，这个世界都不需要另外一本厚厚的著作，因为在这两方面都已有洋洋洒洒的论述。我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一

种立场辩护，而是为了讲述一个故事。虽然我的T恤故事中也有经济和政治说教，但是说教并不是我的出发点。换言之，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传递道德规范，而是为了发现它们，并且简单地关注故事会如何发展下去。

我把个人偏见带进了本书的第一版中，当然到现在我还抱有这些偏见。因为我是一所商学院的教授，具有毋庸置疑的金融和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背景，我知道，我的同事跟我一样都有些令人不快的倾向，认为如果每个人都理解我们能理解的问题，他们就不会再这么争吵了。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列出了自由贸易的案例，而200年后，我们仍在设法确保我们的学生、同胞和英语系的同事能“明白”这些案例背后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一旦他们理解了这些含义，他们就会支持我们的观点。当我在乔治敦碰到抗议者并听到了对T恤的猛烈抨击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那位年轻的女子，无论这位女子本意多么好、多么热情，她还是没有“明白”她应该明白的东西，她需要一本书来解释一些事情，或许她需要的就是本书。但是在追随我的T恤走遍全球，花费了近10年跟农民、工人、激进主义者、政治家和商人交谈之后，我的偏见不再是偏见了。

在市场竞争的利弊这个话题上，关于贸易和全球化的争论早已两极分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际市场竞争会使财富浪潮“水涨船高”，而批评家们则担心自由市场的力量可能造成的残酷后果，特别是对工人和环境造成的后果。批评家担心，服装的自由贸易只会引起工资、工作条件的螺旋式下降和环境的恶化，结果就像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中描述的那样。

然而，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表明，市场的重要性被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家夸大了。我的T恤肯定受到了竞争性市场的影响，这件T恤的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与政治、历史以及避开市场的创造性措施相关，而不是与竞争性市场相关。即使那些对竞争激烈的市场唱赞歌的人也极不情愿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与其说T恤市场的成功者擅长在市场中进行竞争，倒不如说他们善于避开竞争。这些回避措施对穷人和弱者的破坏力比市场竞争本身更大。简言之，

我的T恤故事的结局与市场的相关性比我预测的要少，它更多的是植根于市场的由阴谋织成的历史与政治网络。在层层揭开我的T恤背后的谜底时，我总被带回历史和政治中去。

许多曾经贫穷的国家或地区（例如中国台湾地区或日本）在全球化中富裕了起来，而且许多依然贫困的国家（如中国或印度）也不像以前那样贫困了。然而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部分在非洲，而且还未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从全球化中受益。即使在中国等快速发展的国家，它们的许多领域还是落后的。我的T恤的一生揭示了在某些条件下，全球化有可能增加财富，但在某些国家却是一个“赢不了”的陷阱，一个权力失衡、政治与市场运行拙劣的陷阱，这似乎注定了未来经济的不景气。

我的T恤的故事也揭示了全球化争论中的反方（不管多么无心）在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方面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在最初的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双向运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一方面要满足市场力量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满足社会保护的需求。波拉尼对对立双方的妥协持悲观态度。彼特·多尔蒂曾提出了“经济是较大的文明化工程的一部分”的观点，市场的存续依赖各种形式的反作用力。我的T恤的故事最终证明了多尔蒂的观点：市场及其反作用力都无法单独向贫穷的棉农或T恤厂工人提供这么大的希望，但两者无心的结合就产生了希望。贸易怀疑论者需要公司，公司需要贸易怀疑论者，而最重要的是，亚洲“血汗工厂”的工人与非洲棉农两者都需要。

本书再版可以说是读者对第一版的反响的产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机会跟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学生、商人和决策者就这本简单的产品传记的无数问题进行了交谈。

我的基本观点是，传记这种形式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阐明经济和政治问题，上述许多交谈更加强化了我的这种观点，而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尽管我的T恤的一生并未改变，但这正是我采取的一种方式，我跟读者的许

多对话也说明了我的T恤的故事能够继续引出各种争论。

首先，自本书于2005年出版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尽管我的T恤一生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并未改变，甚至还可能得到了强化，但相关行业的运作方式、竞争动态、与贸易和全球化相关的政治发展方式都出现了很多变化。在本版中，我希望能提供这类变化的最新情况并描述2004年以来我的T恤的世界发生的变化。

其次，2005~2008年，我重游了我的T恤到过的大多数地方，有些地方还去了多次。从这些访问以及与那些T恤的生产者的交流中，我不断地进行着学习。我希望，读者在本书中也能从这些访问和持续的交流中学到东西。我本人也从上百封的电子邮件和许多谈话中受益匪浅，它们使我的观点更有说服力，有助于我对新的研究与案例进行评论，并对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几个话题进行了扩展。

第三个变化发生在2006~2007年。在此期间，我访问了许多大学与学院，例如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艾奥瓦州立大学、科尔比学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以及得州科技大学。换句话说，读者对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在环境方面的启示很感兴趣。与此同时，本书的译本在东京、维也纳和米兰也出版了。再一次，全球的读者想要谈论环境的可持续问题。2008年，我们很难想象哪本关于全球化的书没有涉及环境问题。

当然，我可以写一本全新的书讲述我的T恤的生命历程在环境方面的故事。我不是说我已经写了这样一本书，不过我已经揭示了大量与我的T恤以及更宽泛的贸易与全球化中的环境问题相关的争论。

虽然我写本书并非针对大学市场，但是我收到了许多大学老师的信，他们已经将本书用于各种课程，我特别希望本书提供的最新情况在新背景下依然有用。

与其他评论相比，我更加赞同一些书评人和评论者对本书第一版的看法。有时候，一些书评人解释书里的某个论点时，比我解释得还要好。当我看到

一篇很有见地或能引起我共鸣的评论时，我不止一次想：“真希望我是那样写的。”2005年年底，我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就本书发表演讲。在那里，评论者汉斯·彼得·兰克斯表达了他对本书的看法，尽管他的观点与我不同，但也有助于我对本书的修订。汉斯·彼得说：“阅读这本书有点像绕着佛石花园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没有反面人物，只有活在像史诗般挣扎且处于一个异常复杂、不断前进，而且文化不断改变的企业中的演员。”

当我在2009年年初写本书时，我没有写什么反面角色。我的T恤生命中的每个方面都比21世纪初时的情形要复杂，不过斗争似乎更具有史诗性，演员的改变速度似乎更快。尽管如此，在本书中，我一直记着佛石花园的景象。很简单，我的目标一直都在继续绕着花园转。

如果说我在过去近10年的游历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明白了大学生代表了改变我们社会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1999年，在乔治敦大学的示威游行之后，学生们安静地待在校长办公室并拒绝让步，直到学校及其服装供应商同意解决他们控诉“血汗工厂”的问题。乔治敦的T恤及其他得到许可的服装就是在“血汗工厂”里生产的，类似的抗议也在全美几十所大学中继续着。2008年，学生们及其世界范围内的同胞戏剧性地扭转了全球服装产业的运营方式，彻底地改变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做生意的方式。今天的T恤的故事与几年前的故事相比大不相同，对工人和环境保护来说，它变得更好了。在开始讲述我的T恤的故事时，我想我会让学生以我的方式看待事物，理解市场对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益处。我希望真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但事情并非完全如此。我还对学生们说，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想。我想他们也理解了我。

乔治敦及其他地方的学生继续对公司与大学施压，敦促其改善全球市场中劳工的生存条件，现在，那些关注环境的人也加入了进来。我已经在商业实践与政治争论中看到了这些新的迹象。

我的老朋友仍在这里：纳尔逊、露丝、加里、帕特里克、袁志、奥吉、朱莉娅、吴拉姆以及我在首次环球旅行期间遇到的每一个人。同时，我还有了新朋友：用大豆做的墨水印T恤的埃里克，用玉米原料纺纱的伊琪，推销有机棉的凯利。2008年，我的T恤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和迷人了，成了当代世界里的创造与破坏的小缩影。



寻找我的T恤的出生地

沃尔格林药店
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
1999年春

劳德代尔堡的民权运动领袖在最近几年里使新的印花覆盖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烂醉如泥的冲浪者和喧嚣的大学生已不多见了，他们被新开的咖啡馆和高档酒店从沙滩上抢走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学生现在也已为人父母，手头有钱花了。这个城市像一棵棕榈树那样倒向了金钱一边，被抛光、清洗和上漆。跟所有的旅游目的地一样，瞥一眼这些显眼的印花，就能了解一点其内在的俗艳。虽然城市里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更喜欢画廊，坐落在沙滩上的却是T恤店，因为人们想买T恤。

海滩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出口处有一只盛放T恤的大箱子。它被放在这儿是因为主人希望以此吸引从药店里出来的购物者，而且这个方法的确奏效：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翻这个箱子，哪怕只翻1分钟。箱子里装了上百件T恤，每件5.99美元或两件10美元。所有T恤都印有一个关于佛罗里达的主题——贝壳、鲜亮的鱼或棕榈树。

我把手伸进去，拽出了一件T恤。这是件白色的T恤，印有火红的鹦鹉，下面是“佛罗里达”字样。我走到收银台付款，然后走出药店，来到太阳底下，透过包装纸看着这件T恤。

“就是你了。”我想。

回到华盛顿，我从聚酯袋中取出这件T恤，看着标签。上面写着“谢里制衣厂”，下面是“中国制造”。我在搜索引擎中键入“谢里制衣厂”。几分钟后，我就接通了该制衣厂总裁加里·桑德勒的电话。“当然，”他说，“来吧。从华盛顿到我们这里来的拜访者不多。”

谢里制衣厂位于迈阿密的老工业区，这个离机场不远的工厂与仓库看起来有点荒凉。加里·桑德勒有着被佛罗里达的阳光晒成褐色的皮肤，非常友好，对大学教授有一种善意的怀疑态度。他没有丝毫傲慢，但明显对他和他的家族事业感到自豪。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孩子和他的销售团队的照片。

加里的父亲昆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成立了谢里时装公司，这家公司是以昆廷的大女儿命名的。昆廷从独立批发商起步，他沿着海滩，走进一家又一家商店向店主推销小纪念品。在旅游季节，他通常去纽约提货，然后回到迈阿密兜售他的商品。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在度假时购物，特别是购买纪念品。昆廷发现有热带主题的小物件儿在来自美国北部的观光者中尤其受欢迎。

20世纪50年代，“可穿的”纪念品选择很有限，度假者通常想带些小纪念品回家，而非服装。然而，昆廷发现他最受欢迎的物品之一是一条方巾——一条印有佛罗里达主题的棉布方巾。这条方巾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旅游工艺品一样，在日本生产及印花。不久之后，谢里时装公司发现它处于一个经典的批发商的困境，即利润得从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挤出来。1955年，昆廷·桑德勒抛弃了他在纽约的供应商并在迈阿密开了自己的纺织品印花厂。谢里时装公司摇身变成谢里制衣厂。

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里·桑德勒从大学辍学后加入了父亲的公司，并且在1986年成为总裁。1999年年中，桑德勒的外甥（谢里的儿子）承担起公司日常运营的责任，总裁职位传到了第三代。

如今，谢里制衣厂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印花T恤生产厂。它仍然以旅游贸易为核心。在基韦斯特、佛罗里达、德纳里山、阿拉斯加以及其他许多旅游景点，还有欧洲，都有谢里制衣厂的T恤出售。谢里制衣厂的设计师为每个旅游市场设计主题，而这些主题会在迈阿密的工厂中被印在或绣在T恤上。

无印花的白T恤（还有沙滩毛巾和棒球帽）的存货装满了谢里制衣厂的一个两层的仓库。这些未印花的货物会被从货仓送到印花机旁，印花机就像矗立在货仓旁边的摩天轮。工人把每件T恤在轮辐的平直端上滑过，这样的翻转差不多有14次。每次轮子一停，就有一种不同的颜料从丝网上的微孔中喷出。当T恤回到印花机的初始点时，一位工人把它扯下来传给另一位工人，然后把它平放在干燥传送带上。另一位工人把它从干燥传送带上拾起后，再将它放在第二条干燥传送带上，该传送带将T恤传送至一条管道并将其从管道另一端抛出来。T恤被折叠整齐，不过它不再是T恤，而是一件纪念品。

堆在手推车上的T恤印着诱人的沙滩、高山、摩天大楼和冰川的图案。每件T恤都让人身临其境，人们会穿着它回家。你穿过临近工厂的货仓就像看旅行纪录片，对具有探险精神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凡是去T恤所到的地方你都需要防晒液，但是在它们的出生地，你只需看看T恤就行了。

加里·桑德勒从墨西哥、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孟加拉国、洪都拉斯、中国、巴基斯坦、博茨瓦纳、印度、中国香港地区和韩国购买T恤。2008年，在我和加里再次进行交谈时，T恤的生意比几年前难做很多：竞争，特别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迈阿密的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变幻莫测，外包业务更加复杂。另外，经济增长放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旅游业，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谢里制衣厂的生意。

我的T恤来自中国。它可能于1998年年底从上海出发，几周后到达迈阿

密的港口。这件T恤总共花了桑德勒1.42美元，其中包括24美分的关税。它是1998年在美国服装进口配额体制下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约2 500万件棉T恤中的一件。这件T恤的旅程见证了经济力量克服障碍的能力。要来到这儿，这件T恤要击败美国纺织与服装业和美国南方的国会议员，还要克服迷宫似的让任何人都望而却步的关税与配额体制，但是加里·桑德勒不怕麻烦。尽管美国国会、工业领袖和议员竭尽全力阻挠，尽管有配额和关税的存在，还是有价格最低廉、质量最上乘的中国T恤进入了美国市场。

中国是个大地方。我问桑德勒，T恤到底来自哪里？桑德勒搜遍了他的名片夹，从中抽出了一张。名片上写着“许召敏（音译）先生，上海针织厂”。

“打电话给他，”桑德勒说，“他是个不错的人。他会告诉你一切。”

“许召敏。”我设法朗读出来。

“不，不，”桑德勒说，“他的美国客户称他为‘帕特里克’。”

我邀请帕特里克·许和他的夫人在他们到美国旅行时参观华盛顿，他们接受了我的邀请。

帕特里克·许的业务跨越了东方和西方，穷国和富国。他每年都到美国旅行两次以上，拜访老客户和开拓新客户，关注西方的流行趋势，把美国人的想法带回工厂。尽管帕特里克乐意把白色的T恤销售给像加里·桑德勒这样的老客户，但他对上海针织厂生产的白色T恤的前景并不乐观。来自工资更低的国家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竞争太多了。他认为，用不了多久，他的来之不易的客户将会从其他地方购买T恤。帕特里克正试图把价值链提升到如毛衣这样的花哨商品上。

在1999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帕特里克说：“到中国来，我带你看这一切。”

我想了解整个故事。他能让我看生产T恤的地方？能。那么生产布料的地方呢？当然能。我想进一步试试我的运气：那么织布用的纺锤呢？纺纱厂呢？当然，他都能安排。但是，这可不是故事的开端。棉花呢？为了讲述我

的T恤的一生，我必须从其发源地开始。我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产地之一。我能去农场看看棉花是怎么生产的吗？帕特里克看着这件T恤，说：“好，也许会有困难，我想棉花种在离上海很远的地方，或许在得克萨。”

“得克萨？得克萨在哪儿？有多远？”我问道。我把桌上的地球仪转到中国那边。他能在地球仪上指给我看得克萨吗？

帕特里克笑了。他接过地球仪将其转到地球的另一边。“这里，我想它生长在这儿。”我顺着他的手看去。

帕特里克指的是得克萨斯。